

# 殖民地摩登： 現代性與台灣史觀

陳芳明。著  
by FANG-MING CHEN

Colonial  
Modernity

Historical and Literary  
Perspectives  
on Taiwan



## 「文史台灣」編輯前言

陳芳明（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台灣文學與台灣歷史的研究，在二十世紀八〇年代下半葉開始展現前所未有的磅礴氣象。這一方面是由於戒嚴體制的宣告終結，使長期受到壓抑的思想能量獲得釋放；另一方面則是由於台灣資本主義的高度發達，使許多潛藏於社會內部的人文智慧獲得開發。見證到這種趨勢的日益提升，坊間逐漸以「顯學」一詞來定義台灣文學研究的盛況。

在現階段，台灣研究是否臻於顯學層次仍有待檢驗。不過可以確定的是，以中國為價值取向的研究途徑，已逐漸被以台灣為主體取向的思維方式所替代。這種學術轉向在於印證一個事實，所有知識的追求與探索，都不可能偏離其所賴以維持生存的社會。戰後台灣知識分子的前輩大多致力於言論自由與思想自由的爭取。在強勢的中國論述支配下，台灣學界往往充滿感時憂國的焦慮情緒，以及承受歷史包袱的危機意識。這種沉重而濃厚的政治風氣，自然不利於台灣研究的開展。

解嚴後的十餘年來，幾乎每一門學術領域都次第掙脫政治權力干涉，使知識建構開始與社會改造產生密切互動。「台灣政治學」、「台灣社會學」、「台灣經濟學」等等社會科學的研究，都



## 自序／

## 摩登與後摩登台灣

## 一、摩登台灣

摩登或現代(modern)一詞，可能是二十世紀人類歷史上最為摩登的普遍用語。在地球的每個角落，幾乎沒有人不使用摩登或現代這個名詞。然而，由於摩登到達各個地方的時間並不一致，因此，經過旅行之後它就產生了文化意義上的差異。在歐洲，所謂摩登，具有理性、進步、科學等等的意涵。自十九世紀以降，在殖民主義的擴張下，摩登的觀念也跟著傳播到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第三世界。然而，在被殖民的第三世界，摩登的意義卻有了變化，它轉換成為「風尚」、「流行」、「時髦」等等的同義詞。這種意義的轉變，正好印證歐洲中心論(Eurocentrism)在文化權力結構中的優越地位。

在人類歷史的演進過程中，歐洲白人誠然是優先抵達現代的。自文藝復興的時代以來，歐洲人歷經了宗教改革、重商主義與科技發明等等的重要歷史階段。由於有了宗教改革，才使歐洲人

展，只停留在表面的、點狀的階段。日本殖民者以武力方式把台灣社會推入現代化的漩渦，乃是透過徹底的政經改造與文化改造。處在歷史轉型期的台灣人，在痛苦中嚐到現代化的滋味。從一八六〇年代明治維新開始，日本已經警覺到「遲到的現代性」(belated modernity)的危機。相較於歐洲十六世紀的文藝復興，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十九世紀的工業革命，日本社會到達現代的時間顯然是嚴重落後了。為了消滅這種文化上的時差(time-lag)，日本積極向歐洲文明模仿、學舌、複製。歐洲人擁有維多利亞時代的都市文化如汽車、服飾、禮儀，在東京銀座的日本人也同樣擁有這些器物。現代主義在歐洲普遍傳播時，日本作家也及時創造了現代詩與現代小說。可以想見的，歐洲人在全球各地擴張殖民主義時，日本人也分別在一八九五年擊敗大清帝國，在一九〇五年擊敗舊俄帝國，一躍成為東方強盛的現代殖民母國。「脫亞入歐論」成功地把日本改造成為現代化國家。從而，也成功地使日本的「歷時的現代性」(diachronic modernity)轉化為「共時的現代性」(synchronic modernity)。確切地說，日本社會所具備的現代性不再是遲到的，而是能夠與歐洲文明齊頭並進、同步發展。台灣的歷史命運正是在這樣的變局中，被整編到日本現代化運動的洪流。

摩登，對於台灣社會而言，代表的是啟蒙或進步，抑是蒙蔽或傷害，正是二十世紀台灣知識分子感到苦惱而焦慮的問題。如同所有殖民地社會的情況那樣，台灣的新興知識分子也面對「遲到的現代性」所帶來的文化壓力；他們也學習如何克服在現代化進程上的時差。然而，由於無法掙脫殖民地的身分，台灣社會顯然無法累積足夠的資源，像明治維新以後的日本那樣，成功地把

「歷時的現代性」改造成為「共時的現代性」。被殖民者與殖民者之間的時差既然無法消除，台灣知識分子是否因此就放棄了急起直追的努力？歷史證明，二〇年代至三〇年代開展出來的政治與文學的雙軌運動，足以顯示殖民地知識分子的啟蒙決心與抵抗意志。啟蒙，為的是使台灣社會能夠提早與現代化接軌；抵抗，則為的是使台灣社會能夠加速與殖民體制脫鉤。

然而，現代性與殖民性對台灣而言，並不是可以截然區隔的兩組價值觀念。日本殖民者在時間點上既然搶先抵達現代，並且又把早到的現代性轉化為文化優越性；因此，在統治台灣之際，使得被殖民的知識分子錯覺地以為現代性等同於日本性（Japaneseness）。這種混淆與困惑，在一定程度上使許多知識分子發生認同上的危機。有些人以為，要到達現代的捷徑便是改造自己的人格成為日本人。在現代化與日本化之間，對某些台灣人來說，幾乎是可以劃上等號。他們似乎已經遺忘，在現代化與日本化之間其實還存在一個殖民化的過程。怯於思考、怯於抵抗的部分台灣人，避開了日本統治者的殖民化論述，而直接擁抱了現代化論述。二〇年代、三〇年代台灣作家的小說文本中揭露的認同問題，極其精確點出同時代的許多台灣人，被現代化的假面所蒙蔽，並且選擇最便捷的方式使自己升格成為日本人。

如果歷史是這樣發展，則現代化的道路是不可欲求的嗎？從啟蒙運動中知識分子的立場來看，現代化運動的追求仍然值得積極介入。但是他們非常清楚殖民化與現代化之間的弔詭關係，從而更明確理解到台灣社會若要擺脫殖民體制，則捨棄現代化的道路，別無他途可循。在政治啟蒙運動中，思想與精神的現代化是無可忽視的議題。他們大量介紹西方民主國家的議會制度、民

族自決、自由主義、社會主義等等的思潮，同時也支持現代醫學、婦女解放、禁止鴉片等等的觀念。這些思想啟蒙的成果，可能在日據時期沒有實踐的空間，但是也逐漸沉澱為台灣社會演進過程中的重要文化資產。其中涉及地方自治、議會監督，以及法治精神等等的議題，對於戰後民主運動的發展畢竟開啟了無窮的想像。然而，為了使這些現代思想在台灣根植，殖民地知識分子對日本的威權體制展現旺盛的抵抗精神。這種抵抗文化，也深深影響了戰後的知識分子。

## 二、後摩登台灣

摩登觀念的接受，在二〇年代的台灣就很普遍。台共領袖謝雪紅就曾被稱呼為「モダンボーイ」（摩登男兒）。在三〇年代，台語也出現「毛斷」一詞，與中文發音的「摩登」近似。摩登音樂、摩登服飾、摩登汽車在台北已經正式登場，那種繁華的都市文明，可以在王詩琅的小說中窺見。摩登成為一種生活方式，使台灣社會走向不歸路，而與傳統的漢人生活，以及中國的固有思維，逐漸產生疏離。在殖民化與現代化的拉鋸中，一個具有主體性格的台灣文化也日益在鍛鑄形塑。台灣文化既有日本成分，也有中國因素，卻又不能等同於日本文化與中國文化。這種多重性格的文化認同，對戰後台灣人（包括外省族群）誠然構成無限的困惑。

這種文化認同的多重取向，確實是台灣歷史的產物。要檢討這樣的認同，不能完全無視歷史

過程的存在。以簡單中華民族主義與台灣民族主義來考察，都不能使這種重疊性格的認同問題得到釐清。這當然牽涉各種早到的、遲到的現代性在島上的會合。質言之，不同的「歷時的現代性」在共時的空間同步出現時，就需要一段調整與磨合的過程。這樣的過程特別緩慢的原因，主要在於戰後的統治者仍然停留在舊式威權的思維裡。國民政府在日本的殖民體制之上，又建立了另一個戒嚴體制，使得台灣社會已經具備的現代性受到長期的壓抑。在日據時期，知識分子企圖藉現代化運動來抗拒殖民化。同樣的，戰後的知識分子也希望透過現代化運動來抗拒再殖民化。自五〇年代以降，地方自治運動、議會政治運動、自由主義運動都足以顯示台灣知識分子的現代性思維已臻成熟。

拒絕現代化的威權體制之宣告崩解，是在現代化運動推湧之下完成的。國民黨的戒嚴文化，是依賴美式資本主義而得以維持。但恰恰也是資本主義的擴張，葬送了國民黨的命脈。經濟的高度發達，為台灣社會創造了新興的中產階級。他們具備了國際性、全球性的現代化視野。正是這樣的視野，使他們洞察國民黨戒嚴體制之欠缺現代性。中產階級開始要求政治改革，然而國民黨的開放速度過於遲緩，全然不能趕上台灣社會求變的進程。台灣中產階級在要求經濟解放思想解放之餘，終於被迫展開組黨運動。組黨，是最現代化的政治思潮，在成熟的歷史條件下完成了集結行動。如果說這是台灣式的和平演變，倒不如說這是全世界各種不同民主運動的共同特徵。八〇年代民主之風，席捲歐洲、亞洲的威權社會，在這波瀾壯闊的行動中，台灣知識分子畢竟沒有缺席。台灣社會從落後的再殖民體制中解放時，也適時迎接了全球性的後現代浪潮。



這種歷史的巧合，再次為台灣知識分子帶來另一困惑。八〇年代開放後的台灣社會，究竟是屬於後殖民還是後現代？這樣的歷史命運，使文化主體的建構變得複雜而困難。在殖民地時期，台灣面對的是現代化運動的課題。在後殖民時期，台灣卻又面臨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考驗。從現代化到全球化的歷史進程，使戰後世代的知識分子必須更清楚自己的發言位置。

台灣資本主義的高度飛揚，讓整個社會更形開放。但是，開放並不同於解放，後現代也不同於後殖民。在後現代社會，知識分子致力於主體的解構（deconstruction）。但是，在後殖民社會，知識分子反而是努力追求主體的再建構（reconstruction）。前者是在去除歷史脈絡，後者則是回歸歷史脈絡。從這樣的觀點來看，在全球化浪潮衝擊下的台灣社會，要求的絕對不是解構主體，而應是更加積極地再建構主體。如果這種詮釋是可以接受的，八〇年代以降的台灣事實上才正要步入後殖民時期，並不是飛躍性地邁入後現代時期。

性急地把台灣社會定義為「後摩登」（postmodern）或後現代，主要是因為受到新殖民主義（neocolonialism）的迷惑。在後現代的假面下，許多新世代知識分子並不能認清新殖民主義的陷阱。這就像日據時期的一些知識分子，在未能辨識殖民化之前，就直接擁抱現代化與日本化那般。這說明了現階段台灣知識分子的困難，他們必須比日據時期的啟蒙者更具批判精神。在現代化運動中，日據知識分子所要抗拒的，純粹只是日本殖民者。但是，在今日全球化浪潮中，新世代知識分子要應對的則是各式各樣的複數殖民者。

在後殖民台灣，新的啟蒙運動也正展開。其中最重要的，莫過於台灣歷史意識的再啟蒙運

動。對於迷信後摩登的新世代，歷史感顯得越來越淺薄，越淡漠，甚至是一種嚴重的歷史失憶症（historical amnesia）。在建構台灣文化主體時，歷史記憶的重建顯然已是不能迴避的重要工程。後現代性（postmodernity）到底是早到的還是遲到的，可能不是重要爭議的焦點。台灣社會需要聚焦去檢討的，應該是後殖民性（postcoloniality）的議題。

### 三、在後摩登與後殖民之間

歷史記憶的重建工程，在一九八七年解嚴後已篤定展開。思想的鬆綁，使塵封的歷史文獻重見天日，也使遺忘的文學遺產獲得重新評估。在這場重建運動開展之際，我有幸能夠投身介入。我完成的《謝雪紅評傳》（一九九一）、《探索台灣史觀》（一九九三）、《左翼台灣》（一九九八）、《殖民地台灣》（一九九八）、《後殖民台灣》（二〇〇二），證明我並沒有在歷史現場缺席。或者換一個說法，我以這些勞作來見證台灣社會的另一次歷史轉折。《殖民地摩登》這本書，應該也是沿著同樣的思考而延伸出來的一個結果。

不過，《後殖民摩登》在思考方向上做了一些調整。在此之前的歷史考察，我大致集中在殖民與後殖民兩元對立的議題。最近幾年來，我嘗試在這樣的基礎上做突破的工作。在台灣歷史與台灣文學的發展過程中，現代性接觸是改變歷史軌跡的重要因素。關於這個議題的討論，在後殖民理論中早已相當熱烈展開。這已不完全是被殖民地社會的問題，在帝國主義擴張與再擴張之

際，現代性也是無可忽視的問題。

現代性的議題之所以引起關注，主要在於全球化趨勢之難以抵擋。在十九、二十世紀的現代化運動時期，被殖民者面對的是單一殖民者的權力支配。在印度，知識分子反抗的是英國殖民統治；在阿爾及利亞，抗拒的是法國殖民主義。同樣的，在台灣，對抗的則是日本殖民主義。然而，到了二十世紀後半葉全球化浪潮崛起時，這種權力支配的結構發生重大的改變。舊有的殖民母國以跨國企業方式展開相互結盟，使資本主義不僅沒有如馬克思所預言那樣會崩潰，也沒有如列寧所說「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發展最高階段」而宣告終結，反而得到再擴張的空間，成為新殖民主義的龐大力量。曾經有過殖民經驗的第三世界國家，面對的不再是單一的殖民者，竟然是前所未有的「殖民聯盟」。殖民聯盟（colonial alliance）是我創造的名詞，在於指出過去的殖民者前身，已放棄單打獨鬥的戰略；他們模仿社會主義者的策略，亦即「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的口號，著手進行「全球資產階級聯合起來」。這樣的策略，使得舊有的殖民者得以借屍還魂，透過團結與聯盟的力量，向第三世界再度進軍。台灣社會遭到外來的挑戰已不再是日本資本主義而已，美國資本主義的加盟，並挾帶背後歐洲資本主義的勢力，以著洶湧的全球化名義構成巨大的侵蝕力量。這股強悍有力的殖民聯盟，當然毫不客氣地向亞洲、非洲、拉丁美洲進行擴張。地球的每個角落幾乎都不能免於資本主義的滲透。這種全球資本主義的形成，正是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所說的「晚期資本主義」（late capitalism）。

在戰前被捲入摩登，在戰後被捲入後摩登的台灣，形塑了一種異質的新文學。這樣的文學作

品，有的被標籤為寫實主義，有的被命名為現代主義，最近又出現了後現代主義。這些不同的文學表現，並不能簡易地與西方的寫實主義、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等同起來。因為，台灣作家雖然借用了這些外來的思潮，卻在創造過程中融入自己特有的歷史經驗。在台灣產生的現代主義作品，就不能逕稱為西方現代主義的學舌或模仿，而應該注意到現代主義開始出現在地化的傾向。這種在地化的現代主義，絕對是台灣式的。文化種籽可能是外來的，但在本地的土壤接受滋潤釀造之後，盛放的花朵自然就屬於台灣。台灣現代主義，是接觸現代性以後的產物。在這樣的作品裡，反映了台灣社會穿越殖民時期與再殖民時期的痛苦經驗，面對如此的文學，實在沒有理由輕易指控其為帝國主義的下游或末流。

現代性議題的討論，成為我關心重點的原因，乃是由於這樣複雜的文化暗示早已潛藏在台灣文學之中。我從一九九九年開始撰寫《台灣新文學史》，恍然發現自己過去在理解文學時過於粗糙而簡單。那種只是強調政治正確、強調意識形態的研究方式，曾經耗去我太多的時光。作為後殖民的文學研究者，我已警覺到必須從更為深刻而複雜的歷史層面去探觸台灣文學。尤其當「後摩登」的標籤過早貼在台灣社會時，我相信對於現代性的再考察是必要的。

《殖民地摩登》所收的論文，不是在一定時間內完成，也不是依照一定的主題去書寫。不過，這些論文圍繞在現代性的探索，則是相當接近的。至少，這些研究論文都是為了支持《台灣新文學史》的撰寫。沒有以研究為基礎就直接撰寫文學史，於我是絕對不可能的。十年來的龐大閱讀與廣泛書寫，自然有我的用心所在。許多人都在期待我早日完成文學史的出版，甚至有人認

為我寫得太慢了。這當然是很抱歉的事，不過，建構一部後殖民觀點的文學史畢竟是不能急躁的。每冊學術論文的出版，都在預告我的書寫進度與主要關切，並且也透露我在撰寫過程中的不斷調整與修正。我的另一冊書寫計畫是《現代主義及其不爽》，也正是探索現代性議題的延伸。後摩登時代已經到來了嗎？這是可能值得爭議的問題。不過，我較為確知的是，摩登未完，後摩登是極有可能搶灘的。在全球化的世紀，我的台灣文學研究自然有我的微言大義，而《台灣新文學史》的書寫更加有我的想像與暗示。這樣微弱的書寫，如果能在洶湧的晚期資本主義浪潮中協助台灣維持一絲能見度，於願足矣。

二〇〇四年五月十三日

政治大學中文系

# 目次

「文史台灣」編輯前言

陳芳明

5

自序／摩登與後摩登台灣

9

## 第一輯 摩登與日據台灣

現代性與日據台灣第一世代作家

27

三〇年代台灣作家對現代性的追求與抗拒

51

現代性與本土性

73

——以《南音》為中心看三〇年代台灣作家與民間想像

現代性與殖民性的矛盾

——論朱點人小說中的兩難困境

95

當殖民地的作家與畫家相遇

——三〇年代台灣文學史的一個側面

115

殖民地詩人的台灣意象

——以鹽分地帶文學集團為中心

137

黃得時的台灣文學史書寫及其意義

161

從發現台灣到發明台灣

——現階段中國的台灣文學史書寫策略

189

第二輯 現代性與台灣史觀

殖民地時期自治思潮與議會運動

209

殖民地社會的圖像政治

——以台灣總督府時期的寫真為中心

223





第一輯

摩登與日據台灣